

袁安父子碑刻:汉代篆书经典

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

国宝级 辽宁珍藏
BEIKE

不论是在历史上,还是在书法史上,东汉袁安袁敞父子的碑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。袁敞碑藏在辽宁省博物馆,但从发现至今的100年时间里,这块石碑留下许多谜题,学界也一直在争议。近年来,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,袁敞碑的众多谜题逐一得到破解。



1 父子二人石碑在河南相继被发现

在国家文物局日前公布的第一批《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》中,有两块石碑较为特殊:这两块石碑的主人是父子关系。不仅如此,仅就书法而言,这两块碑刻是后世书法爱好者的重点摹本,广受追捧。而且,从发现至今的百年时间里,学界围绕这两块碑存在的多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。

这两个墓碑碑刻就是“袁安碑”“袁敞碑”,袁安为父,袁敞为子,前者被河南博物院收藏,后者藏于辽宁省博物馆。

父子二人的石碑都是在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被发现的。1923年,袁敞碑首先被发现,6年后,袁安碑也被发现,二者相距1.5公里。

二者相比较,袁敞碑破损严重,袁安碑相对完整。袁敞碑曾被当地村民当作槽基使用很久。因为碑刻残损,又缺少碑主人姓名等重要信

息,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,人们不知道这块石碑的主人是谁。

1923年前后,著名金石学家、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在拿到袁敞碑拓片后,根据碑文中仅存的一些字迹和文字内容,推断出这是一块东汉碑刻。后来,他又结合历史文献,确定这块石碑为东汉重臣袁敞的墓碑。

就在马衡做出这一推断的6年后,袁安碑被发现。因为袁安碑较为完整,字迹清晰,从侧面印证了马衡当初对袁敞碑的判断。

马衡字叔平,袁敞字也是叔平,所以,马衡对袁敞碑十分珍爱,想花钱买下它留作纪念。不巧的是,1925年,这块石碑被洛阳古董商卖给了收藏家罗振玉。后来,袁敞碑进入辽宁省博物馆收藏。

知名书法家、故宫博物院研究员

员杨频对这两块东汉时期碑刻有着多年研究,他这样说:“对袁敞碑的解读,一定要对照袁安碑。一方面,袁安碑较为完整,另一方面,这两块碑刻有太多相似之处,外观形制、碑文内容、书写风格等方面高度一致,在研究的时候二者可以互相印证。”

辽宁省博物馆提供的资料显示,袁敞碑刻于东汉元初四年(117年),碑存高77.5厘米,存宽72厘米,厚10厘米。此碑无碑额,有穿(工匠有目的地在碑上凿的孔),位于第五字下,占两行两字。碑有断缺,碑身篆书10行,每行残存4至8字不等,存70多个字。

袁安的石碑主体尚存,碑高139厘米,宽73厘米,厚21厘米,碑石为竖式长方形(原石为首首,已残为平首),有穿。碑文小篆书写,共10行,行存15字,计139字。

2 东汉朝廷为袁安袁敞同时立碑

文献和石碑记载,袁安死于汉和帝永元四年(公元92年),袁敞死于汉安帝初四年(公元117年)。也就是说,在父亲袁安去世25年后,儿子袁敞去世。既然二人相隔25年去世,二人的石碑不论是形制还是书写风格,为什么会高度一致呢?

疑问还不止于此:——东汉时期,石碑刊刻以隶书为主流,但袁安碑和袁敞碑均以篆书书写,背后原因是什么?

——如果这两块石碑是袁安和袁敞的后人或门生故吏所立,按照东汉习俗和惯例,开篇会与“君讳某某、字某某”,而这两块石碑并不是这样,而是直呼“司徒公袁安”“司空公袁敞”,这又是为什么呢?

对上述问题,杨频有自己的理解。他较认同马衡的推断,即为袁敞立碑时追立袁安碑。

也就是说,虽然袁安和袁敞父子先后去世,但实际上,这两块石碑是同时竖立的,即两块碑是在袁敞去世时一并凿刻竖立。这就涉及另一个话题——袁敞是怎么去世的?

历史文献中对袁安、袁敞有较多记述。袁安,东汉末年豪强袁绍的四世祖,官至位列“三公”之一的司徒。袁敞和他父亲一样,晚年官至“三公”之一的司空,但是,与袁安的寿终正寝不同,袁敞被蒙冤,后策免,他为证清白自杀身亡。

《后汉纪·孝安皇帝纪上》:“夏四月戊申,司空袁敞薨。敞字叔平,少有节操,及在朝廷,廉洁无私。坐子与尚书郎张俊交通,漏泄省中语,策罢。敞不阿权势,失邓氏旨,遂自杀。”而《后汉书·袁敞传》对袁敞的死因记录得较为详细。

简单来说,袁敞的儿子袁旻与尚书郎张俊在通信的过程中,泄露了东汉朝廷的秘密。当时,安帝年幼,邓太后临朝。邓太后一气之下将袁旻和张俊投入狱中,袁敞也因此被免去官职。十分注重名节的袁敞深感绝望,于是选择了自杀。但袁敞没有想到的是,就在儿子袁旻和张俊入狱期间,张俊狱中上书,感动了邓太后,二人最终被赦免,但此时袁敞已经自杀身亡。

《后汉书·袁敞传》中记载:“朝廷由是薄敞罪而隐其死,以三公礼葬之,复其官。”也就是说,因为赦免了袁旻和张俊,所以朝廷也减轻了袁敞的罪名,并且隐瞒他的死因,以“三公”葬礼让其官复原职。

从史书上看,朝廷“隐其死”“复其官”的目的达到了。所以史书中仍以司空官职称袁敞:“司空袁敞薨。”杨频分析认为,正是因为经过了这一波折,所以袁敞碑并不是袁敞的后人所为,而是东汉朝廷为其竖立的。既然是朝廷所立,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袁敞碑的开篇并没有“君讳”等字样,而是直呼其名。

杨频还表示,因为袁敞事发突然,从自杀到入葬前后仅13天,所以肯定是入葬家族墓园。朝廷在为其立碑的同时,也一并为其父袁安立碑,以相同的“薨”字和最高委任等级的篆书字体,含蓄表达对父子的纪念,这就解释了袁安碑和袁敞碑为什么都是直呼其名、为何都用“薨”字、书写内容与行文格式也相差无几等一系列问题。

3 两块石碑上的篆字由同一个人书写

虽然围绕袁安碑和袁敞碑的一系列问题都找到了答案,但还有一个问题——汉代碑刻,一般都是隶书撰写,用篆书来凿刻碑文十分罕见。袁安碑和袁敞碑为什么要用篆书来书写呢?

“这仍与东汉朝廷‘薄敞罪’‘复其官’有关系。”杨频表示,根据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,汉代对诸侯王和“三公”委任的策命,必须用篆书书写,而罢免的策命则使用隶书。

对于袁敞,朝廷通过“三公”规格的葬礼“复其官”,这块碑刻相当于一

张委任状,因此使用了篆书。

那么,袁安碑和袁敞碑的书写者又是谁呢?

“我个人认为,最有可能的书写者是曹喜。即使这两块碑不是由曹喜一个人来书写,也很可能是曹喜和他的弟子一起书写的。”

杨频分析认为,一方面,袁安碑与袁敞碑的篆书风格凸显了曹喜所创的“悬针垂露”法。文献所说“稍异斯法”,就是说当时的篆书与秦代李斯稍有不同。另一方面,袁氏父子所处的时代也与曹喜相当,再加之这两

块石碑均由朝廷设立,担负着朝廷一系列政治使命,所以由当时朝廷中最著名的书法家曹喜来撰写碑文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袁安碑、袁敞碑最吸引引文之处,就是篆书。这些汉篆,既有秦篆基础,又兼具汉代隶书时代的方折特点。这些汉篆字体舒展,结构宽博,迥然自如,婉劲多姿,表现出一种大方、凝重、端庄的气度,代表了汉代一流水准的典型官方篆书风格,是研究中国古代书法文化与碑志发展演变过程的珍贵实物资料。

朝阳博物馆藏辽瓷“四件套”见证草原茶文化发展

本报记者 商 越

精品文物
WEN WU

朝阳博物馆珍藏着一套精美别致的辽代釉陶莲瓣纹系列茶具,显示出浓郁的游牧民族风格。研究发现,随着辽宋茶叶贸易量的剧增,宋人的饮茶习俗在北方游牧民族中普及,契丹族形成全民饮茶习惯,这使辽代饮茶器具也得到了改进和发展,这些茶具展现出多民族融合的艺术魅力。

辽墓出土茶具“四件套”

近年来,朝阳地区的辽墓出土了很多饮食器具。有一座辽代贵族妇女墓出土了20件陶瓷器,它们均属辽窑烧制。其中有一套同一色系,统一纹饰风格的茶具,共四件,为辽瓷珍品,现藏于朝阳博物馆。

茶具“四件套”其一是一把造型独特的茶壶,名叫釉陶莲瓣纹带盖执壶,以莲茎为执把,莲瓣花苞作壶盖;其二是一件绿釉陶莲瓣纹花式托盏;其三是一件绿釉陶莲瓣纹渣斗;其四是一件高大精美的釉陶莲花纹凤首瓶,可用来盛水,高46.3厘米,是辽瓷中罕见的大件,被考古工作者认定为辽瓷的上品。这四件茶具都装饰有莲瓣纹,黄绿色系,造型独特,做工精美。

朝阳博物馆副研究员王冬冬向记者介绍,这座辽墓出土的四件套茶具,工艺娴熟精湛,代表了辽代陶窑烧造技术的较高水平。这种以组合形式出土的器具说明契丹人在饮茶用具上很讲究。

三种方式获得中原茶叶

“汉代时,我国饮茶风俗就已经在巴蜀地区流行。”多年致力于北方民族文化研究的北方民族大学教授张景明发现,在南北朝时期,饮茶风俗传入北方草原地区,唐朝时期已经逐渐被北方游牧民族接受和喜爱。

因为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以肉食为主,蔬菜较少,油腻且不易消化,而饮茶有助消食去腻、促进食物吸收代谢。这一功效让北方各游牧民族对饮茶迅速接纳,并使之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。

北方草原不产茶,那么中原地区的茶叶是通过哪些渠道来到辽朝的?张景明说,辽朝与中原王朝的经济文化交往主要有三种形式,即通过贸易、赠礼、战争掠夺的方式实现交

流。辽代早期,契丹的茶叶贸易对象主要是南唐。辽太宗会同元年(938年),辽朝曾派使者到南唐,“以别持羊三万口、马二百匹来贖,以其价市罗、纨、茶、药。”1004年,辽宋定下“澶渊之盟”后,辽宋互派使节在边境互市,辽的牲畜、毛皮、珍禽等特产入宋,宋朝的盐、铁、丝织品、金银等来辽,其中尤以茶叶数量巨大。随着边贸茶叶贸易量的剧增,宋人的饮茶习俗也在辽朝普及。

辽代中晚期,辽宋之间经常互派使者馈赠礼物。宋朝给辽朝的礼品中,多有茶具和名茶。《契丹国志·南北朝馈赠礼物》中记载:“契丹帝生日,南宋遣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……金花银器三件,银器二十件……乳茶十斤,岳麓茶五斤。”生日贺礼中有名贵的金质茶器、乳茶、岳麓茶等,说明辽朝皇帝对茶具和茶叶的喜好。

随着茶叶供应量的不断扩大,辽代茶具制作水平也不断提高。近年来各地考古发现,辽代饮茶用具数量很多,质地有金、银、铜、铁、瓷、陶等,使用功能也很齐全,包括碾茶器(将茶饼碾碎)、贮茶器、煮茶器、点茶器、饮茶器等。

苏辙写诗记录契丹奶茶

“契丹人饮用茶的品种有奶茶、散茶、饼茶,其中饼茶最为常见。”张景明告诉记者,饼茶是宋朝的主要茶种,也是输入辽朝的主要茶种,而饼茶中又有龙凤茶(团茶)、乳茶、岳麓茶等名贵珍品。

北宋的饼茶制作精细,多出上等佳品。史料记载,宋太宗曾派特使监制皇室专用的小饼茶,其上印有工艺精美的龙凤团纹,故称之为团茶。欧阳修的《归田录》记载:“茶之品莫过于龙凤,谓之团茶,凡八饼重一斤。”可见当时龙凤团茶品质居名茶之首。因团茶和乳茶都产于建州建溪流域(今福建省建瓯市),故又被统称为建茶。宋庆历年间,蔡襄任福建路转运使时,在建州监制出更为精细的

小龙团茶,“其品精绝”“凡二十饼重一斤,其价值金二两”。

宋人张舜民在《画录》中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:北宋宰相苏颂要出使辽朝,副使姚麟建议带一些小团茶去。苏颂说,这是皇宫的御用贡茶,怎么敢送给辽人呢?不久,有贵公子要去辽朝,开始大量囤积团茶。他到辽朝后,用两个团茶换取辽朝生产的丝织品“蕃罗”一匹,回来之后,又用“一罗酬四团”,以物易物,利润翻番,可见团茶在北宋属于茶中上品,在辽朝被奉为极品。

张景明分析,在北宋给契丹皇帝的贺礼中,有乳茶和岳麓茶,但没有龙凤团茶,这大概就是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。《辽官词》中“解渴不须调乳酪,冰翻刚进小团茶”描述的小团茶,应为民间茶商私下的交易品。

因为游牧民族的传统饮品是奶制品,吸收中原茶文化后,游牧民族又发明了新吃法——奶茶。张景明研究发现,在北宋文学家、翰林学士苏辙《和子瞻煎茶》诗中,就有关于契丹人饮奶茶的记载。元祐四年(1089年),苏辙作为贺辽朝生辰使出使辽朝,庆贺辽道宗耶律洪基生辰。他在诗中诗:“君不见闽中茶品天下高,倾身事茶不知劳;又不见,北方茗饮无不有,盐酪椒姜夸满口。”从中可知,奶茶的做法是在煮好的茶中加入鲜奶,茶乳充分交融后,加入盐、花椒、姜等调料,制成游牧民族特色奶茶,鲜香美味被人满口夸赞。

辽瓷吸收融合多民族文化

在辽墓中,有很多反映饮茶的壁画,包括煮茶、进饮、备饮等画面,如河北宣化辽墓壁画《进茶图》。而在随葬品中有大量茶具反映出饮茶是当时的社会普遍现象。

陶瓷器不易携带且容易损坏,并不是游牧民族特有的生活用品。契丹人使用的传统器具多为皮质、木质及金属制品,辽建国以后,契丹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,选择定居生活,陶

瓷器逐渐成为日常生活器物。

辽代陶瓷简称“辽瓷”,是指辽代设窑烧造的陶瓷,辽代“五京”都有烧制陶瓷的场所,且多分布在治所附近。目前,已经发现了十处辽瓷窑场,辽阳江官屯窑就是当时著名的窑场。

史料记载,辽朝建立初期,辽军多次掳掠邢州(今河北邢台)、磁州(今河北邯郸磁县)、定州(今河北定州市)的陶瓷业工匠。这些工匠将先进的制瓷技术和烧造工艺带到辽朝,推进了当地陶瓷业的发展。

辽代陶瓷器大致可分为两类,一类是模仿中原瓷器制作的,如碗、方盘、盏托、执壶、钵、盒等;另一类是具有浓郁的契丹民族文化特色,主要样式有鸡冠壶、凤首瓶、长颈瓶等。

王冬冬说,在辽朝200多年间,鸡冠壶的器形有很大变化。早期的壶形更接近皮囊,形体低矮,腹部浑圆下垂;中期壶身变扁变长;晚期的器身较瘦长,上部的穿孔处演变为提梁,显示出契丹民族由游牧到定居的趋势。正因为辽代早、中、晚期鸡冠壶造型有明显区别,因此考古工作者往往利用它来判断墓葬的年代。

契丹民族极富包容性,政治上“因俗而治”“以国制治契丹,以汉制待汉人”,在陶瓷文化中也显示出海纳百川、博采众长的特点。如常见的宝相花、莲花就是比较流行的中原风格纹饰。而凤首瓶原型是西亚流行的一种银质把壶,唐代传入中原地区,时称“胡瓶”,被契丹工匠吸收。

受周边地区文化影响,辽瓷造型装饰和工艺技法在保留契丹传统元素的同时,也广泛吸纳了中原及其他域外文化的优秀成果,反映出辽朝多民族、多文化、多种社会生活方式相互交融的特征,体现出契丹民族和其他民族艺术相结合的独特魅力。

(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商越摄)



河北宣化辽墓壁画《进茶图》。(受访者供图)

更多精彩内容
扫码观看